

王充哲学思想探索

徐敏



# 王充哲学思想探索

徐 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充哲学

封面设计：倪天煦

**王充哲学思想探索**

徐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16,000字

1979年8月第1版 1982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32,001—37,800

书号 2002·232 定价 0.45元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战斗在儒家和谶纬神学统治的时代 ..... | 1   |
| 第二章  | 有关王充著作若干问题的考订 .....   | 33  |
| 第三章  | 唯物的气一元论 .....         | 51  |
| 第四章  | 无鬼论与薄死厚生思想 .....      | 93  |
| 第五章  | 对“生而知之”先验论的批判 .....   | 119 |
| 第六章  | 时命论及其实质 .....         | 135 |
| 附 录  | 王充年谱 .....            | 158 |
| 后 记  | .....                 | 176 |
| 再版后跋 | .....                 | 177 |

# 第一章

## 战斗在儒家和谶纬神学 统治的时代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代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和战斗传统。但他的思想，无论是在他的生前或是他的死后，都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异端”，受到冷遇、攻击和禁锢。在唐代前期，刘知几就批评王充写《自纪》没有“以扬名显亲为主”，“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sup>①</sup>特别到了宋代以后，封建名教统治最厉害的时代，王充受到的攻击，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宋神宗时的吕南公，由于惧怕王充对儒家的揭露和批判，故意贬低《论衡》的价值，连传播过《论衡》的著名学者蔡邕，也受到无理的诽谤。如说什么“夫饰小辩以惊俗，充之二十万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则欲以独传为过人之功，何繆如之！”<sup>②</sup>南宋时，黄震批评王充说：“谓龙无灵，谓雷无威，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虻虱，欲以尽废天地百神之祀，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凡皆发于一念之怨愤，故不自知其轻重失乎

---

① 《史通序传》第三十二。

② 《题〈论衡〉后》。

如此！”<sup>①</sup>清雍乾时代的杭世骏对王充颂扬其先人反对豪门的斗争，异常痛恨，他咒骂“《论衡》之书虽奇，而不孝莫大”，“则其坏人心，而害世道，莫此为甚也。”<sup>②</sup>清乾隆时，钱大昕责骂王安石变法革新，也是受了王充的坏影响：“后世误国之臣，是今而非古，动谓天变不足畏，《诗》、《书》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盖自充启之，小人哉！”<sup>③</sup>乾隆皇帝在《四库全书·序》中，指责王充的反对孔孟思想：“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为激语以自表，则已有犯非圣无法之诛。”清道光时的赵坦，污蔑王充乃“汉儒之悖戾者也”。他惊呼：“使充之说行，则生人之理灭，而人将与禽兽无别，是驱昭昭之民，而胥入冥冥也，其害可胜言哉！”<sup>④</sup>总之，在他们看来，王充犯了不敬天地、不信鬼神、不祀祖先、不孝父母、诽谤“至圣”的弥天大罪，假使王充的学说见诸实行，将要毁灭封建社会的纲纪伦常，使文明的人类社会生活，沦为禽兽，历史将要来个大倒退。

对于这种历史现象，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有过一段精采的论述：“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由此

---

① 《读〈论衡〉》，《黄氏日钞》分类卷五十七。

② 《论王充》，《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

③ 《跋〈论衡〉》，《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④ 《书〈论衡〉后》，《保觿斋文录》卷上。

看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王充日益受到恶毒的诽谤和攻击，那就不是偶然的了。但科学实践证明，谎言和诽谤压倒不了真理，由于王充的《论衡》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欺骗，击中了他们用神学愚弄人民的要害，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王充的哲学思想，象在茫茫的黑夜里，点起一把火炬，对后代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神学思想的斗争，曾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充是一位“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我们只要认真研究王充的代表作——《论衡》，就会理解到他是批判地吸取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资料，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资料。他对儒家虽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并不全部否定儒家；对法家既有批评，也有继承。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sup>①</sup>恩格斯也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sup>②</sup>王充的哲学，同样是东汉前期的历史产物，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要了解王充哲学思想的实质，以及它在当时的战斗意义，必须对他生活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作一番考察。

---

① 《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1页。

②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82页。

王充诞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二七年), 约逝世于和帝永元九年(公元九七年), 他的思想批判活动和政治活动, 主要是在明帝、章帝两个朝代, 即东汉王朝的鼎盛时期。

东汉王朝是代表豪强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封建政权。以刘秀兄弟为代表的南阳大地主、大商人集团, 因为与新莽政权存在严重的矛盾——王莽的“托古改制”侵害了他们的利益, 所以他们利用农民起义的时机, 起兵反对新莽。但是刘秀集团篡夺农民起义的果实建立起东汉王朝, 又是豪强地主、大商人统治的继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 东汉王朝的正统哲学, 基本上和新莽统治时代一样, 是儒家思想和谶纬神学。王充的唯物主义哲学, 就是和这种反动思想作斗争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汉代的儒家和春秋战国之际的儒家有什么显著不同的特点呢? 谶纬之学是怎样盛行起来的? 它和儒家经书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王莽的新朝被推翻之后, 继起的东汉王朝, 不仅尊儒, 而且还要大事提倡谶纬? 这些问题, 在研究王充哲学思想的同时, 都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讨的。

西汉建国之后, 从高祖到汉武帝, 他们一方面继续了秦始皇开创的统一事业, 又时刻不忘记秦王朝在短促的时间内, 被农民大起义所推翻的深刻历史教训。为了使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长治久安”, 封建统治集团进行了许多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并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七十多年的斗争。他们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 巩固中央集权, 如从分封同姓异姓诸侯王到削平同姓异姓诸侯王的分裂势力, 铲除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强宗巨族的残余势力, 打击大商人兼并土地, 垄断市场, 总之, 其目的就是扫清建



立、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障碍，以进行休养生息，恢复与发展封建经济，为建立强大的封建帝国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对待经常侵扰北方边境的匈奴，因为国力不足，基本上执行和亲政策，尽量避免与匈奴发生大规模战争，以争取一个比较和平稳定的局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与此相适应的，当时的统治思想改变为黄老思想。所谓黄老的“无为之治”，实质上就是休养生息的政治。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所进行的斗争，为汉武帝的统治打下了经济的、政治的基础，但是真正地建立一个空前的强大的封建帝国，并发动驱逐匈奴的战争，消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以保障封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汉武帝来完成了。汉武帝亲政以后，继续打击、削平反对中央集权的同姓诸侯王势力，把国家的权力，甚至丞相的权力，都高度集中在内廷的手中。他把没收得来的大量肥美土地，作为“公田”，归皇室所有；又实行盐铁国营、酒类专卖的政策，大量集中财富。物质财富雄厚了，国防力量强大了，他认为进行驱逐匈奴战争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自从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与匈奴作战被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以后，七十多年来，西汉王朝一直执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大体来说，边境比较安宁；但是匈奴小规模军事骚扰，仍常发生；汉文帝时，匈奴甚至数路入侵，京师长安告急。因此，汉武帝心中始终不忘“平城之忧”。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已经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他便发动了驱逐匈奴的战争。在战争中，他将“开边”得来的土地，又作为“公田”，这样皇室直接占有的土地，超过他以前的任何西汉统治者，汉武帝从而成

为权力最集中的皇帝，又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地主。

在帮助西汉封建统治者特别是汉武帝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过程中，在对匈奴作战的过程中，许多立下了功勋的文臣武将，以自己丰厚的俸禄，或者以汉天子赏赐给他们的大量金钱，在关中到处收购良田沃野，迅速变为官僚大地主。他们是属于汉武帝的统治集团的，只要他们的权势还不威胁皇权的巩固，是不会受到汉武帝的打击的。既然土地占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动，意识形态也必然反映出来。

汉武帝从亲政的时候起，就着手改变西汉前期休养生息的政策，作为这种国策的指导思想——黄老学说，也被宣布为过时的了。既然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已经形成，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就必须鼓吹封建大一统，无限提高君权的权威，甚至达到神化的程度。但汉武帝一直不忘秦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在统治思想方面，他不能不作新的选择。西汉初期，贾谊在总结秦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曾经指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他认为只用法治，专搞严刑重罚，不行儒家的“仁义”，是秦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汉武帝认为董仲舒提出的必须强调教化，讲求儒家的仁义道德，三纲五常，是很适合当时统治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上无限提高皇帝的权威，巩固封建的秩序，调节地主阶级内部的关系，麻痹农民的反抗意识。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的专家。《春秋》是鼓吹大一统、明君臣之分的。《春秋》公羊学以阴阳术数附会儒家的经义，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自然适合汉武帝的统治意志，所以在“贤良对策”中，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便

被汉武帝采纳了。但实际上，儒术并没有“独尊”，百家并没有完全被罢黜，为了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并进行驱逐匈奴的战争，法治仍是不可缺少的，“霸王道杂之”才是汉家的统治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到汉元帝纯用儒术之前，“霸王道杂用”，一直是西汉王朝作为制订政策的指导思想。

这里必须加以指出的，汉代的儒家与春秋时代的儒家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代的儒家，是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的思想，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大乱，阴阳五行思想流行，儒家中有些派别受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带上神秘主义的色彩。到了西汉时代，为了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儒家逐渐完成神学化的转变，它不仅与阴阳五行学说合流，而且吸取原始宗教迷信和方术，使汉代的儒学变成一种专讲天人感应的经学。儒家的经典著作：《书》、《诗》、《礼》、《乐》、《易》、《春秋》号称六经（因为《乐经》之有无还无定论，所以有时又叫五经，有时加上《论语》，亦称六经）。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又加以秦汉之际的战乱，民间典籍散亡，简牍错乱，到西汉建国之初，文化学术领域一片荒凉。汉惠帝时始废除挟书之律，鼓励民间献书，并容许儒家可以在民间开业授徒。但先秦典籍复出，由于版本不同，解释不同，分成许多家，如《书》分为二，《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小戴，《春秋》有公羊、谷梁，但它们基本上属于一派。到了哀、平时代，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以《国语》注释《春秋》，出现了《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因为以战国文字书写，称为经古文学；《公羊春秋》等经，因为以秦汉时通行的隶书书写，被称为经今文学。

《公羊春秋》的作传者公羊高，专以灾异传经，讲天象与人

事的关系，董仲舒根据汉代中叶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将这一派的思想，发展到高度，从而成为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继承了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法家的中央集权思想，齐学的天人感应论，战国秦汉方士们的阴阳术数，……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神学思想体系。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是人格化的最高造物主，阴阳是天产生万物的本源，天人合一，君权神授，自然现象与人事可以互相感应，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则是受着五行终始的支配。

照经今文学家看来，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他不仅是一位大学者、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先知。当时周道衰微，应再受命，天生下这样一位圣人，本应让他代周为一统之君的。孔子是殷人的后代，商汤以水德王，孔子本应以水德受命；但他生不逢时，周是木德受命，按五行相生，木不能生水，他虽然是一位天生的圣人，却做不了君主，而成为“素王”。他只好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他编定的六经里。因为他预知汉代必将继周为一统，便作《春秋》为汉制法。“《春秋》采毫毛之美，贬纤芥之恶”，一字之褒贬，都寄托夫子的微言大义。所以经今文学家，主张通经致用，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三百篇作谏书。《春秋》本是鲁国一部编年史，编著权是否属于孔子，尚难肯定，怎么能够把《春秋》的编写与“为汉制法”扯在一起呢？于是儒家又编造说：周武王伐殷之时，有火德的祥瑞。周以火德受命是无疑的。按五行相胜，水胜火，代周的应为本德，所以秦朝自认以水德王，色尚黑。但儒者说，秦祚太短，不能算作一统，正式继周为一统的，应为汉代，所以汉初有些儒者认为汉以水德受命。这样，孔子修《春秋》为汉制法，就

说得通了。但刘邦是以反秦起家的，西汉王朝又是继承秦制，秦朝明明是一个朝代，怎么能够把它抹煞呢？秦既为一统，以水德王，汉应为土德。这个问题争论了一阵之后，只好不了了之。但是经今文学家，为了争取正统思想的地位，仍坚持孔子为汉制法的观点，董仲舒强调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从这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董仲舒宣扬的《春秋》之道，是为强化汉武帝的封建国家服务的。因而得到汉武帝的支持。汉武帝还指示以后的贤良对策，要以《春秋》对，毋以纵横对。至于汉朝究应以水德王，还是以土德受命，那就不必深究了。

西汉中叶以后，随着官僚大地主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封建统治越来越腐朽，皇权日益走向衰落，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刘向为代表的儒家，大力鼓吹谴告论，企图以灾异警告人君，希望他们好好振作一番，以挽救封建统治。在这种形势面前，地主阶级中出现了安刘派与易姓派之争。以董仲舒思想为代表的儒家，都属安刘派，主张在维护刘汉政权的前提下，对腐朽的封建政权进行修补，加强对农民的镇压。易姓派则认为，汉家气数已终，应当易姓再受命。后来，王莽及其追随者刘歆等人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王莽以阴谋手段篡夺了汉家政权，并用儒家《周礼》的学说，“托古改制”，推行所谓井田制，即王田制，来代替汉武帝的“公田制”，企图限制当时激烈的土地兼并，实际上，却是王莽集团所代表的豪强地主、大商人，用“托古改制”的政策，对土地及社会财富进行更大规模的兼并和掠夺。这就促使阶级矛盾的

白热化。王莽为了篡权，通过刘歆在《春秋左氏传》里伪造刘邦是尧的后裔、以火德王的历史；王莽又自认是舜的后代，以土德王，火生土，唐虞揖让，舜受尧禅，王莽受汉禅的理论根据就这样编造出来了。

王莽为了欺骗人民，又指使他们的党羽，大量制造符瑞和谶纬。王莽居摄，自比周公，一些无耻之徒，迎合主子的旨趣，制造了所谓周公居摄辅成王的祥瑞。王莽阴谋要作真天子，又大批制造以土德代替火德的祥瑞。许多大小官僚，甚至京师的流氓无赖，也竞相仿效王莽，为自己制造祥瑞，有不少人因此而做了大官，甚至封公封侯的。谶纬之书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就盛行起来。大科学家张衡说，刘向领校秘书时，阅尽九流，尚无谶录；谶纬之作，起自哀平。他的说法是可信的。

谶本是一种预言、隐语，由来已久。到了秦朝，一些儒生、方士，因为反对秦始皇，就散布种种谶语。到了汉代，儒家为了把孔子扮成一位大圣人、通天教主，就用谶语来附会儒家的经义，将孔子说成是一个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人。方士们为了做官，大批挤进了儒家的行列。儒家方士化，方士儒家化，这是汉儒不同于春秋战国之儒的一个显著特点。

纬是对经而言，凡是经书都有纬。广义的纬，是指混杂谶文及术数之书；狭义的纬，专指七纬：《诗》、《书》、《易》、《礼》、《乐》、《春秋》、《孝经》之纬。如诗纬《汜历枢》，书纬《考灵曜》、《帝命验》；易纬《稽览图》，礼纬《含文嘉》，春秋纬《演孔图》、《文命道》、《保乾图》；孝经纬《援神契》、《钩命诀》等等。这些纬书都起了一个离奇怪诞的书名，含义诡秘，令人费解，以此增强其内容的神秘性。纬书是经义的衍伸，以荒诞不经的预言、

神话传说、原始迷信附会儒家的经义，鼓吹什么圣人不通过学习和实践，能预知过去未来。当然在纬书中也记载一些自然科学的成就，表达一些被神学歪曲了的科学观点，也保留了一部分神话传说，但总的说来，是封建迷信与儒家思想的混合。

王莽不论推行“托古改制”也好，大搞讖纬、符瑞也好，都无法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他妄想通过对少数民族发动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以缓和阶级矛盾，但远征万里，暴兵连年；劳役和兵役不息，刑罚严峻，赋税愈重；贪官酷吏，贪残于内；老百姓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大批青壮劳动力离开了农村，田畴荒芜，再加上水旱虫灾，劳动人民走投无路，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波腾浪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新莽天凤四年（公元十七年），临淮人瓜田仪起义攻占会稽长州；琅邪人吕母又杀守令在山东起义。湖北西北部的饥民推举新市人王匡、王凤为领袖，举行起义，以湖北当阳的绿林山为根据地，号绿林军；他们分兵两路，转战于湖北西部、北部，河南西南部，一路号下江兵，一路称新市兵。新市兵攻入隋县，平林人陈牧率千人应之，号平林兵。新莽天凤五年（公元十八年），琅邪人樊崇，逢安在山东莒县领导农民举行总起义，号赤眉军。赤眉军转战于山东、苏北、河南、河北、安徽一带。绿林军经过昆阳大捷，取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然后分兵进攻洛阳和长安。在胜利形势下，长安城中的反莽力量攻入皇宫，杀死王莽於渐台。

当绿林、赤眉起义的后六年（新莽地皇三年，公元二三年），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县西北）的豪强地主兼大商人刘

缤、刘秀兄弟乘机起兵反莽，一开始，刘秀等人就以图讖作号召。宛城（今河南南阳）大地主、大商人李通以图讖说刘秀：“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企图证明他们反新兴汉是天命所归。王莽为了证明他以土德受命，篡改刘邦以火德受命；刘秀改变王莽的旗号，自认为他安刘兴汉是以火德受命。于是以火德受命的符瑞便出现了。编造者胡说刘秀诞生时，“有赤光照室中”，“起兵还春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建武元年（公元二五年），刘秀行军至河北鄗南（今赵州高邑县）宣告即皇帝位时，又让群臣引用讖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作为他受命为天子的依据。因为在《春秋演孔图》这本纬书里说：“卯金刀，名为劉，赤帝后，次代周”。现在讖记有“卯金修德为天子”，该是应刘氏复兴，以火德王了。所以即位的次年，便“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色尚赤”，讖纬和符瑞是刘秀夺取政权的命根子，绝不能随便丢掉的，这是东汉王朝提倡讖纬的根本原因。在东汉的领导集团中，也大多数出身豪强地主或大商人，许多人受过儒学的教育，他们既通经，又晓讖，如李通，“南阳宛人也，世以货殖著姓，居家富逸，为闾里雄。”邓禹，“南阳新野人，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寇恂，“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冯异，“颍川父城人，好读书，通《左氏春秋》。”贾复，“南阳冠军人也，少好学，习《尚书》。”祭遵，“颍川颖阳人也，少好经书，家富给”。朱祐，“南阳宛人也，……尚儒术。”刘秀本人也在天凤中“之长安，受《尚书》”。由此可见，汉光武本人以及“云台二十八将”中，大多是南阳一带的豪强地主、大商人，而且都是深通儒学的，这也决定了东汉王朝建立之后，要以儒



家和讖纬作为统治思想。在新莽时代，经今文学家与经古文学家互相攻击，争吵不休，到了新莽政权将要垮台时，经古文学家又投奔新的主子了。不管你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在东汉王朝的统治下，都得通晓讖纬。“学通五经，兼晓讖录”，是一时的风气。到了汉光武中元元年（公元五六年）朝廷正式宣布图讖于天下，定为功令必读之书。当时思想界的状况，正如王充所说的：“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对作》）到处讲神讲鬼，迷信到了极点。因为经有数家，家又有数说，经义的解释，日益流于烦琐，学者莫知所从。到了汉章帝建初四年，在白虎观举行了经学会议，在皇帝亲自主持下，统一了观点，统一了提法，会后写成的《白虎通》一书，由皇帝钦定颁行，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儒家神学思想的统治地位。

在新莽时期，激起农民大起义的基本原因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大批自耕农失去了土地，沦为地主阶级的附庸，或者到处流亡。经过农民战争，农村的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土地兼并暂时趋于缓和。但农民战争只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篡夺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东汉王朝，仍然是代表豪强地主、大商人利益的政权。不过，应该看到，刘秀集团在开国之初，他们慑于农民战争的威力，又迫切感到需要恢复社会经济，他们不得不在政策上作了一番调整。汉光武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禁止虐杀奴婢，又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查核、限制豪强地主的占田亩数，在政治上，限制外戚干政。这些政策，在一定时期内，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光武、明帝到章帝，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